

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23.08.002

张刚生：“中印比较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主导政党推动”，《太平洋学报》，2023年8期，第15-30页。

ZHANG Gangsheng, “The Implic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Driving Force of Dominant Political Party”, *Pacific Journal*, Vol.31, No.8, pp.15-30.

中印比较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主导政党推动

张刚生¹

(1.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要:同为人口规模超大之后发国家的中国和印度,皆取得了重大的现代化成就。比较发现,无论是现代国家建构,还是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抑或工业化基础的建立,中印两国都是在主导政党推动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强度、主导国家发展持久性等方面优于印度的主导性政党,使得中国更有效地实施各项现代化改革,继而让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大幅领先于印度。2014年印度人民党获得主导地位后,在政党组织建设、推动国家建构、促进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趋同。虽然印度人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在组织能力、统领国家建设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但其推动印度现代化的努力愈发与中国共产党趋同,则体现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共通性。以一个强大的主导政党推动国家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也为其他后发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印度;后发国家;主导政党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23)08-0015-16

秩序与繁荣兼备的现代化发展是后发国家的普遍追求,但放眼世界,取得重大现代化成就的后发国家数量并不多,一大批后发国家的贫困状态依然没有改变,有些甚至还在经历动荡与战乱。在为数不多取得重大现代化成就的后发国家中,中国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不仅保持了政治与社会稳定,而且还跻身中高收入国家之列,并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那么中国何以取得骄人的现代化成就,中国的现代

化道路蕴含了哪些可供其他后发国家借鉴的共通规律呢?从研究方法上讲,跨国比较是发现共性与规律的有效途径,因此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既需要考察中国的历史与经验,还需要放眼世界,与他国进行对比。为了科学而精准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本研究遵循最大相似性的比较原则,选取印度这个同样拥有超大规模人口的后发国家进行比较。

收稿日期:2022-12-20;修订日期:2023-04-2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计算社会科学背景下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变革研究”(19BZZ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刚生(1986—),男,山东菏泽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治。

*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中印现代化进展与既有研究

1.1 中印现代化概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后发国家,中国和印度在独立后皆取得了显著的现代化成绩。中印都已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参与到国际社会,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以经济总量来看,2022年中国GDP总量已近18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而印度GDP总量也达到了3.39万亿美元,超过了英国,位列世界第五,且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印两国都实现了大规模减贫。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以日均花费不低于2.15美元的联合国标准,2019年中国的贫困率已经降到了仅有0.1%,同年印度降到了10%。

虽然中印两国都取得了巨大的现代化成就,但是比较而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要高于印度。从现代国家的建构水平来看,中国显著领先于印度。以作为国家统一性建构重要标尺的语言为例,中国已经普及了规范汉字和普通话,而印度依然未有统一的官方语言,现行宪法中规定的官方语言高达22种。使用最广泛的印地语,2011年时能熟练使用的印度人口比例也只达到了57.1%,南部、东部和东北部诸邦能说印地语的比例大都在20%以下;^①同期中国能够使用规范汉字的人口占比超过了90%,普通话普及率达70%,到2020年又分别提升到了95%和80.72%。中国已经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区域协作成了常态,而印度邦与邦之间交流与合作仍相对困难。2021年7月,阿萨姆邦与米佐拉姆邦因边界问题发生严重暴力冲突,造成阿萨姆邦一方6名警察死亡,印度的国家整合难度可见一斑。伴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推进和对传统社会的彻底改造,中国在建国初期就实现了国家对暴力机器的垄断,国家权力可以直达公民个人;而印度国家权力至今对社会的渗透还存在诸多空白,社会中广泛存在着私刑。^②从社

会层面上讲,中国通过彻底的社会改造,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实现了人人平等,而印度高低种姓之间的隔阂至今依然十分明显,^③妇女平等仍然任务艰巨。^④

相较于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现代化方面的差异,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领先则更为直观。2022年中国GDP总量是印度的5倍多,同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2 814美元,而印度仅有2 379美元。中国和印度凭借着丰富廉价劳动力,皆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流入中国的外资大幅多于印度。1992年到2020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3.8万亿美元,同期印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6 000亿美元。制造业对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后发国家来说。^⑤但两国工业化水平差距甚大,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5万亿元(约4.9万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达30%,位居世界第一,而同年印度制造增加值仅为6 155亿美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公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对外投资达1 33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国,而同年印度对外投资仅有120亿美元。^⑥

两国人民生活水平与福祉改善程度也有很大不同。随着2020年底脱贫攻坚战的顺利完成,中国在全域范围内消除了绝对贫困。虽然

^①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Census of India 2011", https://www.censusindia.gov.in/2011Census/C-16_25062018_NEW.pdf,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1日。

^② Arryan Mohanty, "All About Mob Lynching in India", *Law Insider*, April 30, 2022. <https://www.lawinsider.in/columns/all-about-mob-lynching-in-india>.

^③ Surinder S. Jodhka, *Caste in Contemporary India*, Routledge, 2017, pp.1-15.

^④ Radhika Coomaraswamy, "To Bellow Like A Cow: Women, Ethnicity, and the Discourse of Rights", in Joshua Castellino, ed., *Global Minority Rights*, Routledge, 2017, pp. 89-107.

^⑤ Nobuya Haraguchi, Charles Fang Chin Cheng and Eveline Smeets, "The Importance of Manufactur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This Changed?" *World Development*, Vol.93, No.5, 2017, pp. 293-315.

^⑥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1", June 21, 2021, <https://unctad.org/webflyer/world-investment-report-2021>.

印度的减贫成绩也非常显著,但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印度贫困人口多达2.28亿。生活水平与福祉的改善会对国民预期寿命有着直接影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长到2021年的77岁,增加了42岁,同期印度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70岁,增幅为35岁。从联合国公布人类发展指数来看,也可以发现两国存在较大差距。2021年中国排名79位,位居高人类发展国家(High HDI countries)之列,而印度为132位,处于中度人类发展国家(Medium HDI countries)之列。^①

1.2 中印两国现代化既有研究

对中印两国发展的比较,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② 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与两国对外开放、开展全球贸易密不可分。^③ 而两国对外开放的实现,都是通过政府推动。^④ 从模式来讲,中印两国的现代化有很多共性,特别是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且常常扮演着社会发展引领者的角色。中印这种通过国家强制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还被学者概括为“强制性发展”。^⑤

国家(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是中印现代化模式的共同特征,而且也是两国现代化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如巴利·博斯沃斯(Barry Bosworth)等人的研究发现,造成中印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于印度政府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资不如中国。^⑥ 2012年,阿马蒂亚·森指出印度可以向中国学习两个方面:关注公共支出重点的评估检查,强化对公共部门的问责。^⑦ 2017年印度学者维杰·乔希(Vijay Joshi)进一步指出,印度发展不如中国,关键点不仅因为国家作用不够,而且还缺乏市场,因此印度未来需要增强国家能力,让国家更加积极有为,借助国家力量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建立全国统一市场。^⑧ 除经济发展之外,消除贫困的现代化道路上中印两国之差距,也是因为中国政府更加积极地对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⑨

也有学者更进一步,认为国家(政府)能力

与行为都是表面因素,更深层的在于中印制度不同。戴维·史密斯指出:“中国领导人要想完成什么目标总能成功,包括一些宏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是中国经济的骄傲。可当印度的领导人想要达成什么目标时,他们往往只能祈求事情会如愿以偿,因为他们知道政治决策和实践之间是有很大大差距的,印度的民主制度往往会惩罚那些太有雄心的政治家”。^⑩ 进一步追根溯源,中印两国之差异,关键在于建国之初的制度选择,正是这种制度差异让中国进行了比印度更加彻底的土改和社会改造运动。^⑪

总的来讲,既有中印发展比较研究,大都强调国家或政府之重要作用,却往往对决定国家(政府)权力运作的关键性力量——政党视而不见。尤其是欧美主流学界常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不仅回避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推动因

①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The 2021/2022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https://www.undp.org/sites/g/files/zskgke326/files/2022-09/hdr2021-22pdf_1.pdf.

② 有相当一批学者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认为印度模式优于中国,如黄亚生和Tarun Khanna在2003年在Foreign Policy杂志发表的文章“*How India Overtake China? — Comparison and Study on Development Model of China and India*”等,但这些已被现实证伪,故不再赘述。

③ Enrico Marelli and Marcello Signorelli, “China and India: Openness, Trade and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8, No.1, 2011, pp.129-154.

④ Philip Keefer,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in Alan Winters et al., eds., *Dancing with Giants: China, Ind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7, pp.211-242.

⑤ 黄迎虹:“强制性发展:中印征地逻辑比较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2期,第85-105、194-195页。

⑥ Barry Bosworth and Susan M. Collins,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22, No.1, 2008, pp.45-66.

⑦ [印]阿玛蒂亚·森、刘民权、夏庆杰等著:《从增长到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5页。

⑧ Vijay Joshi, *India's Long Road: The Search for Prospe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⑨ 张淑兰、黄靖媛、赵伟康:“‘亚洲的戏剧’:中印消除贫困的现代化路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32-49页。

⑩ [英]戴维·史密斯著,丁德良译:《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⑪ Ashwani Saith, “China and India: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Differential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39, No.5, 2008, pp.723-757.

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对印度的政党也少有提及。很多学者对近年来印度人民党崛起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违背了民主,走向了威权,^①甚至有学者称之为“在滑向法西斯主义”。^②与国外研究者不同,专注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者,都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将其概述为政党中心主义。^③虽然中国学者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根本,但大都没有放在跨国比较视野下,因此难以对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与他国共通之规律做准确概括。

其实对后发国家来说,政治因素至关重要。正如罗斯托所说:在政治方面,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必要条件,起飞的到来不仅要等到社会基础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农业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要等到一个准备把经济的现代化作为严肃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业的政治集团的出现。^④而在现代政治条件下,这样的政治集团集中表现为政党。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本研究选择比较两国的政党为切入点,以总结中印两国现代化道路之异同。

二、主导政党与中印现代化基础的建立

2.1 以党建政

从政治方面看,现代化的首要内容是对外主权独立、对内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的形成。^⑤中印两国作为传统文明古国,皆孕育过灿烂的文明,但两国现代化却从被列强侵略、逐步丧失国家主权开端。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起鸦片战争,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后,列强通过多次侵略战争等,在中国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支配中国的政治,阻碍阻止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⑥针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抗争。面对亡国灭种之危局,农民、封建地主阶级

和资产阶级中的先进中国人,先后努力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但皆以失败告终,都未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国家不独立,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短暂春天很快被战后重返中国的列强终结就是例证。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谋求独立的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依靠强大的政党组织,领导中国人民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其在中国的特权,实现了国家独立。

相较于中国,印度被英国入侵的更早。早在1757年印度就沦为了英国殖民地,并在1849年被英国全部占领。同中国人民一样,受英国剥削与压迫的印度人民一直在抗争。直到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印度人民谋求独立的斗争才获得较大进展——在国大党的组织和动员下,印度人民谋求独立的运动逐渐成组织化和规模化。^⑦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带来的幻灭感冲击,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大党放弃了与英国殖民者的合作政策,并在甘地等人的号召下,组织印度人民开展多次大规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⑧最终印度人民在国大党带领下,在1947年8月15日宣布独立,并于1950年1月26日成立共和国。

① Priya Chacko, “The Right Turn in India: Authoritarianism, Populism and Neoliberalis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48, No.4, 2018, pp.541-565.

② Bhatti Kiran and Nandini Sundar, “Sliding from Majoritarianism toward Fascism: Educating India under The Modi Regim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35, No.6, 2020, pp.632-650.

③ 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13-22页。

④ [美]罗斯托著,郭熙保等译:《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4页。

⑦ Chandra, Bipan, Mridula Mukherjee, Aditya Mukherjee, etc., *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Penguin Books, 2016, pp.47-55.

⑧ Simone Panter-Brick, *Gandhi and Nationalism: The Path to Indi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I.B. Tauris, 2012, pp.26-33.

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国大党不仅领导了各自国家的独立运动,而且还分别主导创建了中国和印度的政治制度,推动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国家,结束了清末以来军阀割据统治的四分五裂局面。与此同时,伴随着解放全国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下,中国建立起了从中央、大行政区、省、地(市)、县、区一直延伸到基层的政府系统,初步形成上下贯通、集中高效、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国家行政体系。^①1947年至1949年,国大党主导制定了印度宪法,搭建起了印度的政治架构。面对宗教多元且彼此分歧严重的现实,国大党将世俗主义原则写入宪法,将不同宗教教徒统合在一起。^②凭借着尼赫鲁的强大魅力和独立运动中积攒的影响力,国大党在1951—1952年的中央和邦议会选举中皆大获全胜,拿到了第一届人民院74.4%的议席。1956年和1962年两次大选,国大党皆获得了人民院70%以上的绝对多数,在此期间,国大党也赢得了大部分地方选举。如此一来,印度形成了以国大党主导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体系,拥有了能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③并通过去殖民化等措施推动国家建构。^④

可以看出,虽然中印两国独立方式,一个是通过暴力革命,一个是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都能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个主导政党。独立后,中印两国皆在主导政党推动下,将全体国民聚合起来,建立起了现代政治架构,形成了一个能够统御全国的中央政府,结束了各地分裂或分散的局面,从而让两国拥有了现代化所需要的基本政治前提。

2.2 主导政党推动社会现代化改造

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人们崇尚在统一的通用规则基础上决定地位和处理角色。^⑤平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开始按照相同的价值与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⑥也就是说,现代化必然伴随着社会变革,同时要求国民拥有平等的身份并按照全国通行的法律与

规则行事。而中印两国社会内部古老且传统,皆存在着根深蒂固且鲜明的等级制度与观念,还高度异质化。虽然列强的侵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印两国社会的前现代状态,尤其是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但对人口规模巨大且历史悠久的两国来说,主流社会结构与文化依然是前现代的,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

为了推动本国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国大党皆对各自国家的传统社会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农民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950年冬到1952年底,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完成,铲除了地主剥削与控制农民的根基,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为全民人格平等、共同参与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⑦土地改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如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在各地农村开展文化扫盲运动,并进行扫除封建迷信、改革陈规陋习等移风易俗活动。这些以土地改革为基础的农村社会改造运动,让广大贫下中农得到了解放,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社会基础。^⑧

同中国类似,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也在印度推行了土地改革。1946年,国大党在其纲领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53-355页。

② C. A. Perumal, "Nehru and Secularism", *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8, No.3, 1987, pp.299-306.

③ Rajni Kothari, "The Congress 'System' in India", *Asian survey*, Vol.4, No.12, 1964, pp.1161-1173.

④ Sumantra Bose, "Decolonization and State Building in South As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8, No.1, 2004, pp.95-113.

⑤ [美]帕森斯:“模式变项与社会系统的结构分析”,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2页。

⑥ [美]艾森斯塔特著,张旅平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⑦ 余君:“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5期,第33-37页。

⑧ 谢迪斌:“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乡村村落的改造与重建”,《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8期,第41-52页。

中提出了废除柴明达尔地主制。1950年代初,印度国大党又在各邦开始推动立法,设定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并将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权授予政府。到1950年代末,印度农村豪门的大规模地产已经不复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国民平等。^① 针对印度社会中国民平等的最大障碍——历史上长期奉行的种姓制度,国大党更是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革除。^② 在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努力下,1950年颁布的印度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平等理念。随后印度议会通过了《不可接触违法法案》《印度婚姻法》《印度教继承法》等一系列法律,废除了高低种姓之间不可接触的历史传统,打开了高低种姓之间通婚的限制。印度国大党推动制定的这些法律,还促进了妇女解放与平等,让妇女拥有了选举权和出任国家任何职位的权利。此外,印度国大党主导的印度政府还努力普及教育,提升公众文化水平。

作为后发国家,中印两国内部社会的现代化变迁,不是逐渐内生的,而是在欧美列强的殖民刺激下开启的。主导政党推动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造,这使得中印两国社会的现代化变迁更加剧烈。剧烈的变革,势必遭致传统力量的抗拒与掣肘;对传统社会组织与文化的改变,也让传统社会粘合纽带不再,而新的社会纽带往往未能及时建立,继而很可能造成社会失序。^③ 事实也证明,中印两国主导政党推行的社会改造,确实受到了传统力量的反抗。面对传统力量的反抗,中国共产党借助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对其进行消灭和改造。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供社会组织功能,充分保证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④ 印度国大党凭借独大地位,既让印度独立初期的社会改造得以推行,同时还维护了印度的政治与社会稳定。^⑤

2.3 主导政党借助国家力量开展工业化

经济繁荣是现代化的最直观表现,也是现代化的物资基础,而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主要特征。^⑥ 独立之初的中国与印度,都是一个农村占主导地位、以农业为主的贫穷国家,因此都

面临着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的重任。而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本。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印所处之国际环境,让其不可能像欧美先发国家那样以殖民掠夺方式实现资本积累。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快速增长的国内人民需求,也不允许中印通过自发市场秩序长时间缓慢积累。这就使得中印两国短期获得大量工业化资本的途径,只有借助国际资本和通过国家强制积累两种方式。中印独立后,为了推动本国工业发展,两国都借助了国际支持。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就援建了156个工业项目,并以这些项目为中心开始工业化建设。英国、美国、苏联和联邦德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在很多关键领域帮助了印度工业的发展,仅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美英等6个国家组成的国际财团就向印度提供了50多亿美元。^⑦ 无疑,国际援助加速了中印两国的经济与工业化发展,但是对人口规模超大的两国来说,仅仅靠国际支持是不足以实现惠及全民的工业化的。此外,如果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主要依靠国际资本,又容易形成依附,导致发展成果更多地被欧美列强所拿走。^⑧ 为了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资本积聚与积累,中印两国都选择了学习苏联模式,通过

^① John Murphy, "Insulating Land Reform Constitutional Impugnment: An Indian Case Study",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 Vol.25, No.2, 1992, pp.129-155.

^② Myron Weiner, "The Struggle for Equality: Caste in Indian Politics", in Atul Kohli eds., *The Success of India's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93-225.

^③ [美]艾森斯塔特著,张旅平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56-159页。

^④ 何海根:“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整合——基于现代化的分析视角”,《科学社会主义》,2020年,第6期,第72-78页。

^⑤ Rajni Kothari, "The Congress System Revisited: A Decennial Review", *Asian Survey*, Vol.14, No.12, 1974, pp.1035-1054.

^⑥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5.

^⑦ [美]斯坦利·沃尔波特著,李建欣等译:《印度史》,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368页。

^⑧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勇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283页。

国家力量以计划手段推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①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既保证了城市商品粮和农产品原材料的供应,又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加速了中国工业化所需资本的积累;而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短时间内实现了资本积聚。正是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让中国工业化快速拥有了资本基础。^②此后十年,中国主要依靠国家力量和集体积累,建起了武钢等十大钢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电子、石油化工、航天等工业也逐步建立并发展,形成了囊括十几个基本行业的机械工业。通过国家强化积累和投资,“三五”和“四五”计划基本完成,建成了一大批工矿企业,形成了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体系和扎实的工业基础,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同中国类似,印度工业化基础也是在国家的指导与保护下建立起来的。^③1950年,印度成立以尼赫鲁为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负责制定五年计划,并将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置于政府部门的控制之下。在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推动下,1951年印度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加大国家对矿业投资,推动印度工业发展。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1966年,印度一跃成为世界第七大工业国,钢产量超过700万吨,发电量五年增加了2倍多。^④英迪拉·甘地出任国大党领导人和印度总理期间,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工业的控制,实施更加激进的土地改革,并由中央政府控制粮食批发市场,加大农业积累对工业的支持,让印度工业取得了进一步发展。^⑤简而言之,国大党的主导下,借助国家力量,印度拥有了较为扎实的工业基础。^⑥

可以看出,类似的现代化初始条件,让中印两国皆走上了以主导政党推动现代化的道路。

在各自主导政党的推动下,中印两国都建立起了现代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之基础。当然,中印两国以主导政党推动现代化之路也存在显著差异。

三、主导政党差异与中印现代化革新程度之别

3.1 中印主导政党之别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从严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发展壮大起来并取得政权的,这造就了党组织十分严密——拥有从中央到地方再到深入基层的完整组织体系,实行党员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政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遵照执行。^⑦与中国共产党相比,主导印度发展四十余年的国大党的组织强度弱很多。虽然印度国大党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拥有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基层的组织体系,但是组织程度较为松散,国大党的地方组织中的骨干常常不服从国大党中央组织,而且内部派系斗争激烈。^⑧在尼赫鲁死后不久的1969年,英迪拉·甘地及其支持者就与地方传统精英在银行国有化等问题上激烈对立,而使印度国大党分裂。1978年,英迪拉·甘地与其追随者再次脱离原国大党,组建新的国大党(英迪拉

① Thirukodikaval N. Srinivasan, “External Sector in Development: China and India, 1950–89”,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0, No.2, 1990, pp.113–117.

② 程广云,“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选择”,《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0期,第27–34页。

③ Atul Kohli,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57–290.

④ [美]斯坦利·沃尔波特著,李建欣等译:《印度史》,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366–368页。

⑤ Yogendra K. Malik and Dharendra K. Vajpeyi, *India: The Years of Indira Gandhi*, Brill, 1988, pp.1–6.

⑥ Prabhat Patnaik,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India Since Independence”, *Social Scientist*, Vol.7, No.11, 1979, pp.3–19.

⑦ 孙照红,“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建设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9期,第42–51页。

⑧ Paul R. Brass, “Factionalism and the Congress Party in Uttar Pradesh”, *Asian Survey*, Vol.4, No.9, 1964, pp.1037–1047.

派)。政党组织模式的差异,让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性以及公众的动员能力大幅领先于印度国大党。

其次,中印两国主导政党执掌政府的模式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居于政府之上又在政府之中,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领导皆由党组织选派,从而保证了党和政府之间是一致的,执政党的政策能够顺利被政府实施。^①印度则是政党与政府之间存在鲜明分野,执政党的中央组织与议会(政府)机构中的执政党组织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加之不少出任议会(政府)重要职务人员并不是由执政党中央组织安排或推荐的,这就容易导致执政党的中央组织与执政党在议会(政府)中的党组织常常不一致。以长期主导印度发展的国大党为例,该党的中央组织与该党在印度议会(政府)中的组织之间往往存在明显分歧。^②即便在威望甚高的尼赫鲁掌权时期,印度国大党中央组织与该党在议会(政府)中的组织之间也都发生过矛盾激化的情况。^③这种党政分野带来的政党内部分歧,加剧了执政党内部派别之间相互掣肘,进一步削弱了印度执政党推行其政策主张的能力。

再次,两国国内不同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同。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是合作关系而非竞争性关系。如此以来,不仅避免了党争带来的政府能力下降,而且还保证了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牢牢掌控中国国家政权,从而避免了执政党更迭带来的政策不稳定。印度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虽然在国家独立初期,印度国大党凭借着尼赫鲁的领导魅力与独立运动中的巨大声望,掌控了印度中央政府和大部分地方政府,但是由于反对党的存在和地方力量的掣肘,加之国大党内部的统一性不足,导致印度政府权力强度以及上下统一程度与中国有较大差距。随着国大党历史资源的耗散,国大党不仅失去了众多邦与地方的执政地位,也逐渐失去了对印度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1977年至1980年印度国大党便沦为了在

野党。虽然英迪拉·甘地让印度国大党再次赢得独大地位,但其死后,印度国大党便失去了单独执政的能力。自1989年起,印度进入了多党纷争、轮流坐庄的时期。^④无疑,主导政党地位的下降乃至丧失主导地位,让印度的执政党(联盟)受到更多掣肘。

3.2 主导政党差异导致中印现代化基础不同

主导政党推动建立了中印两国的现代化基础,但由于主导政党之间的差异,让中印两国的现代化基础存在差异。首先中印两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水平存在显著不同。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形成了中央集权现代国家。^⑤面对民族不平等与差异,中国共产党推动了各民族的解放与平等,推动共同发展,普及国民教育,塑造国民认同,形成了统一的现代国家。^⑥与中国共产党类似,印度国大党也是国家的创立者,但面对各地分散的局面,国大党仅将印度组建为一个联邦国家,这使得印度的中央集权程度大幅低于中国。借助印度国大党主导地位,印度中央政府保持了对各邦较大影响力,但随着国大党主导地位的衰减以及地方政党力量兴起,印度中央政府对各邦的控制力不断弱化。^⑦

中印两国主导政党差异,也导致了两国社会现代化改造存在显著不同。凭借着强大的组

① 祝灵君、张博：“人民政府论的建构——党领导政府体制的百年探索与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7期，第14-21页。

② Marcus F. Franda, “Th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of India’s Congress Party”, *Pacific Affairs*, Vol.35, No.3, 1962, pp.248-260.

③ Stanley Kochanek, *The Congress Party of India: The Dynamics of One-Party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4-5.

④ Yogendra Yadav, “Electoral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hange: India’s Third Electoral System, 1989-99”,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34, No 34/35, 1999, pp.2393-2399.

⑤ 何显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浙江学刊》，2020年第6期，第4-14页。

⑥ 燕继荣、王江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逻辑”，《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3期，第3-13页。

⑦ Christopher Candland, “Congress Decline and Party Pluralism in Ind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1, No.1, 1997, pp.19-35.

织能力,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层社会进行了大规模而又彻底的现代化改造,不仅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且进行移风易俗运动等,并领导建立起了新的基层组织。^①但国大党组织较为松散,印度没能像中国一样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虽然废除了高低种姓不接触规定,但是并未改造种姓文化,也未改变身份不平等背后的土地不平等基础。当然,尼赫鲁也尝试进行土地改革,但不仅未得到国大党上下一致的认真贯彻,反而遭到一些来自高种姓的地主及显要人物的国大党精英骨干马虎对待甚至暗中破坏。^②印度国大党组织强度相对较弱,加之基层组织深入社会程度有限,使得印度平权改革存在很多空白点。如1956年通过的《印度教继承法》《领养与赡养法》等推动印度妇女解放与平权的法案,将穆斯林妇女排除在外。针对宗教多元的现实,印度国大党秉承世俗主义原则,试图淡化宗教色彩、调和宗教矛盾,但由于印度国大党无力对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致使宗教矛盾延续和发酵。^③自1989年进入多党纷争时期后,政府权力不足,社会整合式改造更难以进行,致使不同宗教教徒之间的冲突时常发生,每年仅宗教诱发的社区冲突就造成2000人以上受伤,上百人死亡。^④

伴随着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改造,将地主等传统势力彻底消灭,从而为建立新的基层组织铺平了道路。而印度国大党无力对印度社会进行彻底的现代化改造,致使传统“精英”依然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基层社会。以农村基层组织为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在建国初期就在全国农村建立起了代表广大中下层农民的基层组织,^⑤而印度自1959年开始推广建立的“5人村委会”这一基层组织,在印度大部分地区皆由代表高种姓利益的传统权贵充任。^⑥

中印主导政党的差异,也让中国工业化基础优于印度。工业化初期,面对缺乏资本的困境,中国共产党通过强有力统一领导和大规模组织动员,短短三年就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利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奠定了

条件。^⑦尼赫鲁也尝试在小农户之间建立合作机制,但是由于印度国大党地方精英的敷衍与阻挠,导致了农业合作化的失败。^⑧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她以强硬的作风让农业合作化有所推进,但与中国制度化的农业支持工业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还实施了三线建设,让众多中西部落后地区也拥有了工业基础,形成了比印度更加优化的国民经济布局。

3.3 主导政党差异导致中印市场化及配套改革不同

以国家力量通过计划手段建立工业基础之后,面对全球化兴起,中印两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皆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放松政府管控,扩大私营经济和外资的经营空间。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全球化迎来快速发展期,中印两国都进行市场化改革,积极融入全球市场。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方针,并扩大对外开放。1991年,印度纳拉辛哈·拉奥(Narasimha Rao)领导的国大党联合政府上台后,印度正式放弃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取消大多数行业许可证,减少国有企业数量,降低关税等。^⑨

① 易新涛:“建国初期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重构”,《理论学刊》,2015年第2期,第91-97页。

② [英]爱德华·卢斯著,张淑芳译:《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③ Ainslie T Embree, *Utopias in Conflict: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In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pp.55-74.

④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Lok Sabha & Rajya Sabha Parliament Questions & Answers”, <https://www.mha.gov.in/MHA1/Par2017/PARQueAnsPage-new.html>,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1日。

⑤ 江燕:“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初创时期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26-32页。

⑥ [美]斯坦利·沃尔波特著,李建欣等译:《印度史》,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366页。

⑦ 谢冬水、黄少安:“国家行为、组织性质与经济绩效: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政治经济学”,《财经研究》,2013年第1期,第27-37页。

⑧ 同②。

⑨ [美]芭芭拉·D.梅特卡夫、托马斯·R.梅特卡夫著,李亚兰等译:《印度史》,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第284-285页。

虽然中印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与时间节奏高度相似,但两国的改革力度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共产党强有力领导下,中国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和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同期的印度则恰逢从国大党一党独大转变为了多党纷争,即主导政党缺失期。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人民党和左翼政党一同反对拉奥政府的经济政策,致使拉奥的多项市场化改革措施受阻。1996—1998年又进入政局动荡期,短短不到2年时间,印度更换了四任总理,落实经济市场化改革更是无从谈起。1998年后,虽然政局相对稳定,但无论是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执政,还是国大党领导的全国进步联盟上台,都会受到反对党(联盟)的掣肘,致使很多限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迟迟不能被移除。

以税制改革为例,两国的差异就十分明显,而以强征税能力和中央财政集中为关键性内容的国家能力对经济长期增长有着决定性影响。^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税制一直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为了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早在1994年中国就实行了建国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提升了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建设。^②之后又有多次调整,主要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适用的税制,让税制更加简洁;大幅度下调关税并规范税收优惠,将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从1992年的43.2%下调到2011年的9.8%;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③与中国相比,印度对其复杂税制的改革则缓慢的多。中央税和各邦地方税多处重叠且各邦之间的税率存在显著差异,不仅给企业跨邦经营带来了诸多不便,还给官员在征收企业税时提供腐败空间,严重阻碍了印度统一市场的形成,继而限制着大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经营。由于缺乏主导政党,势均力敌的党争让印度政府迟迟不能对其落后的税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④随着税制对经济发展制约越发严重,印度政府终于在2010年提出了“商品与服务税”改革,但由于政党之间相互掣

肘,致使改革未取得进展。

在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深入同时,也需要对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府机构和行政模式进行改革。为此,中国共产党先后多次对政府进行改革,精简与调整机构,转变政府职能等等。^⑤印度由于缺乏主导政党,政府自身的改革进展缓慢乃至根本无法付诸行动。例如,2004年国大党元老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出任印度总理后,声称其优先任务是改革政府和公共机构,但在印度人民党等反对党掣肘下,辛格并没有实现他所期待的变化。

消减贫困,让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包容性发展是现代化要求。^⑥中国共产党不仅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一贯主张,而且还通过多项措施扎实推进。例如,针对农业农村落后与农民贫困问题,2005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新农村建设,通过逐渐加大政府财政支持等,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次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就同比增长了14.2%,达3397亿元。与此同时,还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如建立“新农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分别在2010年、2012年实现了全覆盖。同期,印度政府也采取了多项减贫措施,主要可以分为创业扶持类、保障工资雇

^① Mark Dincecco and Gabriel Katz, “State Capacity and Long-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6, No. 590, 2016, pp. 189–218; 卢凌宇、胡怡:“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能力建构(1970—2013年)”,《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5期,第67–80页。

^② 吕冰洋、台航:“国家能力与政府间财政关系”,《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94–107+128页。

^③ 赵书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伟大成就、成功经验与未来展望”,《管理世界》,2021年第10期,第26–40页。

^④ M. Govinda Rao, “Tax System Reform in India: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Ahead”,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16, No. 6, 2005, pp. 993–1011.

^⑤ 赵宇峰:“政府改革与国家治理:周期性政府机构改革的中國逻辑——基于对八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考察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21–130页。

^⑥ Sixto K. Roxas and Gerardo R. Ungson, “From Alleviation to Eradication: A Reassessment of Modernization, Market-based, and Communitarian Solutions to Global Poverty”, *Poverty and Public Policy*, Vol. 3, No. 2, 2011, pp. 1–25.

佣类、食品安全类、社会保障类、城市减贫类等。^①虽然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缺乏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组织有力的主导政党,致使政府能力不足,结果是印度这些扶贫项目并未达到设想的目标,与中国的扶贫成绩相比存在显著差距。^②

四、印度一党主导模式复归与中国式现代化趋同

4.1 单一政党主导印度发展格局再次形成

2013年9月,拥有突出政绩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莫迪被印度人民党确定为该党总理候选人。莫迪带领下,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大选赢得了282个印度人民院议席。时隔30年,印度大选再次出现了单一政党掌控议会下院半数以上席位的局面。印度人民党的主要对手印度国大党仅获得44席,未达到成为正式反对党的议席占比门槛,让印度人民院自1969年以来首次无正式反对党。与此同时,印度人民党在邦和地方选举层面也大有斩获。自此,标志着印度再次进入了由一个政党主导国家发展的局面。^③

获得主导地位的印度人民党积极推动自身变革。首先,提升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和中央组织机构(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权威,强化政党统一性。^④印度人民党将所有联邦议会议员候选人以及各邦首席部长候选人的选择,改由党的中央组织确定。与此同时,强化了人民院和联邦院中的印度人民党党团委员会对本党议员的约束力,保证本党议员按照印度人民党中央的要求统一行动。推行党组织重要职务自上而下任命模式,邦一级的政党负责人主要由印度人民党中央任命,地方和更基层的政党组织负责人由上级印度人民党组织任命。无论是选择的政治候选人,还是任命的党组织重要人员,以必须遵守印度人民党的规定作为首要条件。此外,将政党经费更多地掌控在中央组织,借助信息系统,自上而下分配资金,从而进一步强化中

央权威和政党统一性。

其次,大规模招募党员,增强基层动员能力和影响力。脱胎于国民志愿团(Rashtriya Swamsevak Sangh,缩写为RSS)并与其有着密切联系的印度人民党,在国民志愿团500多万成员和5万多个基层组织的加持下,本就具备了比国大党更强的基层动员能力,这也是印度人民党取得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⑤2014年10月底,印度人民党主席阿米特·沙阿(Amit Shah)要求中央邦党部大规模发展党员,自此印度人民党开始多途径宣传其独特的入党方式——电话、网络平台或街头实体摊位都可以登记入党。沙阿还要求印度人民党基层工作者深入到原政党影响较薄弱的农村和边远地区,让更多人加入印度人民党。从2015年4月到2019年8月,印度人民党党员数量增加了7千多万,总数达1.8亿。^⑥虽然通过电话、网络登记等方式快速入党的党员在大选时并不一定投印度人民党的票,但是大规模发展党员策略有力地推动了印度人民党之理念与主张的传播,并将印度人民党的组织触角伸向最基层,扩大了印度人民党

^① C. A. K Yesudia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mes in India: A Social Audit", *Indi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 Vol.126, No.4, 2007, pp.364-373.

^② Jayati Ghosh,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and India: Policy Implications of Recent Trends", in Jomo Kwame Sundaram et al., eds., *Poor Poverty: The Impoverishment of Analysis, Measurement and Policies*,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pp.111-148.

^③ Suhas Palshikar, "India's Second Dominant Party Syste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52, No.11, 2017, pp.1-10; Arjan H. Schakel, Chanchal Kumar Sharma and Wilfried Swenden, "India after the 2014 General Elections: BJP Dominance and the Crisis of the Third Party System", *Regional & Federal Studies*, Vol.29, No.3, 2019, pp.329-354.

^④ James Manor, "The Ruination of the BJP's Organisation in 10 Steps", *The Wire*, September 3, 2022, <https://thewire.in/politics/bjp-organisation-structure-modi-shah-ruination>.

^⑤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Modi-centric BJP 2014 Election Campaign: New Techniques and Old Tactics",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23, No.2, 2015, pp.151-166.

^⑥ "BJP to Add 7 Crore New Members: J P Nadda", *The Times of India*, August 29, 2019,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bjp-to-add-7-crore-new-members-j-p-nadda/article-show/70894220.cms>.

在印度中下层中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① 得益于庞大党员数量和广泛基层动员,印度人民党在2019年大选中进一步扩大优势,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所获人民院席位增加到303个,且赢得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邦议会选举。^②

可以看出,印度人民党愈发将该党改造成为一个类似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中央组织具有最高权威,秉承党员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且拥有庞大的党员数量和基层组织。主导地位更加稳固的印度人民党在更加统一的政党组织加持下,让印度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了显著加强,也促进了上下政令的统一。在印度人民党的主导下,印度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4.2 类似中国的印度人民党主导之改革

(1) 政治与社会变革,促进国家建构

与中国相比,印度甚至可以称为“散装国家”,这虽与印度施行联邦制有关,但更关键的是国家建构程度较低,造成不同地区与群体之间存在明显隔阂。^③ 由于国家统一性不足,致使印度政府实施的多项改革无法有效落实,继而阻滞了印度现代化发展。为了提升国家统一性,印度人民党主导下,印度政府实施了多项政治与社会变革。^④

长期以来,印度对宗教少数群体及其生活聚集地区的整合相当薄弱。印度人民党获得主导地位后,采取了多项措施以加强对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伊斯兰教徒的整合。^⑤ 例如,2019年7月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将实行了上百年的伊斯兰教婚姻传统——男人对妻子说三遍“离婚”(Triple Talaq)即可休妻的行为定为犯罪。此举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未完成的妇女解放工作向前迈进一步,让众多女性伊斯兰教徒也拥有了平等的国民身份。为了促进国家统一和中央政令畅通,印度人民党还对宪法进行了改革。2019年8月印度人民党控制的议会废除了宪法第370条,取消了延续70多年的印控克什米尔高度自治地位,将该地区纳入中央直辖。

语言繁杂是印度国家统一性提升的重要障

碍。^⑥ 为了推动语言的统一,2014年6月刚成立的莫迪政府就要求所有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银行等优先使用印地语,并采取奖励措施鼓励使用印地语。莫迪还率先垂范,在国内外演讲、社交媒体平台等频繁使用印地语。2019年5月印度人民党主导地位巩固后,推出了新教育政策草案(The draft New Education Policy),试图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鼓励在教育中普及印地语。虽然印度人民党统一全国语言的举措受到地方势力等的反对,印度人民党仍在继续努力。

虽然印度国家建构任务繁重,障碍重重,但是印度人民党获得主导地位后,一直努力推动印度从多元的联邦制国家向着一体化的民族国家演进。^⑦

(2) 经济改革,改善市场环境

为了像中国一样能够拥有统一的全国市场和便利的税制环境,印度人民党取得主导地位后,便着手进行税制改革。2017年7月,印度人民党主导下印度开始实施独立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商品和服务税”(GST)改革。新实施的“商品和服务税”将全国税率统一简化为四档,大幅减少税种,并简化缴税流程。税制改革后,不仅方便了企业进行财务核算,而且降

^① Pradeep Chhibber and Rahul Verma, “The Rise of the Second Dominant Party System in India: BJP’s New Social Coalition in 2019”, *Studies in Indian Politics*, Vol.7, No.2, 2019, pp.131-148.

^② Neelanjan Sircar, “The Politics of Vishwa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the 2019 National Election”,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28, No.2, 2020, pp.178-194.

^③ Devesh Kapur, “Why Does the Indian State both Fail and Succee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4, No.1, 2020, pp.31-54.

^④ Yamini Aiyar and Louise Tillin, “‘One Nation’, BJP, and the Future of Indian Federalism”, *India Review*, Vol.19, No.2, 2020, pp.117-135.

^⑤ Giorgio Shani, “Towards a Hindu Rashtra: Hindutva,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in India”,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Vol.49, No.3, 2021, pp.264-280.

^⑥ Amit Ranjan, “Language as An Identity: Hindi - Non-Hindi Debates in India”, *Society and Culture in South Asia*, Vol.7, No.2, 2021, pp.314-337.

^⑦ Brian Girvin, “From Civic Pluralism to Ethnoreligious Majoritarianism: Majority Nationalism in India”,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26, No.1, 2020, pp.27-45.

低了企业跨地区经营的纳税税率;从政府角度来讲,税制改革增加了征税的透明度,减少了税收征缴腐败,减少了偷税漏税行为,增强了国家征税能力。^①

作为与中国一样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的印度,也非常期待成为像中国一样的制造业大国。^② 印度人民党主导政局后,为了推动印度制造业的发展,除税制改革外,还实施了多项改革措施,为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投资经营提供便利。例如,2015年废除了只允许中小企业生产的20个产品的限制,大型企业也可以从事该类产品的生产;将工业生产许可最长有效期从2年延长到7年。此外,还将煤矿开采业对私营企业和个人开放,允许其进行投资。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将建筑行业全面对外资开放,并允许外资投资铁路建设等。2019年印度人民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后,继续推进和深化经济改革。为了提高企业经营积极性,2019年9月印度人民党控制的议会通过了《企业税削减法案》,将企业所得税从30%降到25%。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2021年3月通过法案,允许外资在保险、国防领域的持股超过50%,最高可达74%。与此同时,印度人民党还进行了更为棘手的劳动法改革,先后通过了《工资法》《社会保障法》《劳资关系法》《职业安全健康与工作条件法》等,放宽对企业用工的多项限制。

相较于中国,印度市场环境还有更多的企业经营限制,暂扣乃至没收外资企业资产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印度人民党优化市场环境的改革思路却非常类似中国共产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努力。

(3) 实施惠民工程,提升包容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从而将现代化成果为全民共享。^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中国实现包容性发展的要诀。^④ 同中国类似,印度人民党获得主导地位后,也推动实施了众多颇具难度的惠民措施,并借助印度人民党在地方和基层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推动惠民措施的落实。2014年6月,印度人

民党领导人莫迪刚就任总理,就要求国有银行为穷人开设账户,让穷人有机会接触银行和信贷机构,不再受高利贷剥削。为鼓励个人开户,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印度政府为每个账户所有人提供1650美元的人寿保险,并要求银行对没有余额的账号不收管理费。穷人拥有了银行账户后,可以直接收到国家各种补贴,避免腐败官员截留,同时也能拉近国家与公众特别是偏远地区居民的距离,提升国家认同。^⑤

2014年10月,印度人民党主导的印度政府提出了“印度清洁运动”(Swatchh Bharat Mission),利用政府财政支持、树立形象大使等多种方式,力图在2019年甘地诞辰150周年时实现全印度范围内普及厕所,消除开放式大小便现象。2014—2019年间,在政府资金支持下,300多万政府雇员和大学生被动员参与到该运动中,共为1亿个农村家庭和600万城市家庭建造了厕所,此外还在城市建设了近600万个公共厕所,将印度厕所的普及率从2014年的38.7%提升到2019年的100%。^⑥ 2020年3月,又实施了第二阶段的“印度清洁运动”,以巩固第一期成果。2015年8月,莫迪政府投资25亿美元,进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目标让全国所有家庭都通电,到2018年3月已经实现了印度所有农村都拥有了电力服务。2016年5月又开始实施“总理光明计划”,该项目投资11亿美元,为全国

^① Anand Nayyar and Inderpal Sin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 in India", *Indian Journal of Finance*, Vol.12, No.2, 2018, pp.57-71.

^② "Want to Transform India into Manufacturing Hub, Says PM Modi at SCO Summit", *India Today*, September 1, 2022,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prime-minister-narendra-modi-sco-summit-address-manufacturing-hub-2001008-2022-09-16>.

^③ 韩美群、余漩:“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4-21页。

^④ 李钢、陆易:“中国为什么能实现包容性发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9-17页。

^⑤ Alka Chaudhary, "PMJDY—A Study of Its Role in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In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nagement and Pharmacy*, Vol.6, No.5, 2017, pp.14-17.

^⑥ Government of India, "Swatchh Bharat Mission", <https://sbm.gov.in/sbmdashboard/Default.aspx>,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1日。

5 000 万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妇女家庭免费接通燃气。同年还实施了农村地区修建 50 万个池塘计划,以改善广大农村地区在旱季缺水的问题。2018 年 2 月莫迪政府推出了由政府资金支持的医疗保险计划,该项目将为 5 亿印度贫困人口提供大病医疗保险,每个贫困家庭的大病报销上限达 50 万卢比(约 5 万人民币),并计划在未来四年在全国建立 5 万个康复中心。^①

虽然部分福利项目还在实施过程中,且效果可能与预期目标有一定距离,但这些举措已经让广大印度公众切实受益,从而增强了公众特别是中下层对莫迪和印度人民党的信任。^②这些惠民工程也是印度人民党进行广泛社会动员、扩大影响力的有效手段。^③通过这些全国性的惠民工程,印度国家权力深入到了基层社会,加强了国家与公众之间的纽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实施的“村村通”工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扶贫攻坚计划等相比,印度人民党主导下的这些惠民工程还有较大差距,但其背后体现的在经济发展同时加强对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扶持从而实现包容性发展,无疑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共通的。

可以看出,印度人民党利用其独大地位,并通过强化政党自身组织统一性和动员能力的改革,让印度中央政府的权力强度和效能大幅提升,借此在提升国家建构、推动经济建设、促进包容性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与中国共产党相比,虽然印度人民党的组织强度以及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印度人民党为解决印度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模式,极其类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现代而做的各种努力。印度自 2014 年以来现代化模式与中国的趋同,反映出同为人口规模巨大,内部差异显著的后发国家,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共通性困境,所采取的应对方略是相通的。

五、总结与讨论

通过中印两国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

化与印度的现代化有很多共通之处:主导政党领导下,实现了国家独立,推动国家建构,改造了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以国家力量建立了工业化基础,然后积极进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发展经济,与此同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推动包容性发展。也恰恰因为中国的主导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强度、主导国家发展强度与持久性等方面显著优于印度的主导性政党,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多个方面大幅领先于印度。中印现代化之所以有很多共性,是因为中印两国同为人口规模超大的后发国家都存在以下问题,主要包括国家不独立以及繁重的国家建构任务、内部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掣肘、政治与社会失序风险大、缺乏发展经济的资本、内部发展不均衡等。面对共同困境,中印两国皆走上了以主导政党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并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虽然大多数后发国家并不像中国和印度这样历史传统悠久且拥有超大规模人口,靠着他国力量也可能获得经济的较高水平发展,但是进行现代国家建构,对传统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对社会弱势群体帮扶,哪怕中小规模国家也是必须的,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对其他后发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欧美先发国家不仅将其政治经济社会形态当作现代化的目标,而且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冠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后发国家凡是不遵循西方模式现代化道路的,皆受到强烈批判,乃至受到欧美国家的制裁。例如,欧美先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实行势均力敌的竞争性政党制度,

^① “India’s Modi Launches ‘World’s Largest’ Health Insurance Scheme”, Aljazeera, September 23, 2018,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09/india-modi-launches-world-largest-health-insurance-scheme-180923095218001.html>.

^② Yamini Aiyar, “Modi Consolidates Power: Leveraging Welfare Politic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30, No. 4, 2019, pp.78-88.

^③ Ajay Gudavarthy and G. Vijay, “Social Policy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India: Producing Hierarchical Fraternity and Polarized Difference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51, No.2, 2020, pp.463-484.

于是就将称之为“民主”,且认定为民主的唯一版本。如果后发国家不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哪怕不是势均力敌的政党竞争,都被归为“不民主”或“半民主”之列,特别是由一个政党主导国家发展的模式时,必冠以“专制”“威权”予以否定。再例如,欧美先发国家尤其是英国、美国长期以自由市场模式发展经济,国家仅扮演“守夜人”角色,于是欧美就将其视为“市场经济的标准版本”,凡是国家发挥积极作用的模式都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而国家亲自参与和扶持经济的发展模式更是被予以否定,认为不可持续。其实欧美先发国家很早就告别了“自由市场”模式,经济危机时国家出手干预是常态,政府需求所创造的经济产值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欧美国家也常实行举国体制,尤其是国际竞争激烈的时期。虽然欧美先发国家为后发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很多经验,但按照欧美模式追求现代化发展的后发国家,绝大部分并未获得突出的现代化成就,甚至还陷入了政治动荡、中等收入陷阱等等困顿局面。

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之所以在后发国家遭到失败,究其根本,在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处境与欧美先发国家现代化的处境存在根本不同。欧美国家现代化之时,全球范围内还有很多处女地,而且还可以凭借先发优势对后发国家进行殖民侵略。但等到后发国家发展之时,欧美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其主导的世界体系,后发国家处于边缘地位。这让后发国家面临着强烈的国

际压力,更无法通过殖民方式转移内部矛盾、缓解国民生存压力、获得经济发展的资本,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也不允许其进行殖民侵略。巨大的国际压力,让后发国家无法通过长期的自然演进实现国家共同体整合与社会现代化转变。欧美现代化的先进示范效应,借助大众传媒,让后发国家的国民有着急迫的现代化发展欲望。激烈的国际竞争叠加快速动员起来的国民需求,让后发国家没有足够的时间在经济上缓慢积累与发展。也就是说,欧美先发国家经历的两三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后发国家需要压缩在百年内乃至几十年内完成,而且还是在更加不利的国际环境下,这就决定了后发国家必然要走一条不同于欧美的现代化道路。

后发国家要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大发展,显然不能在政治上搞多党纷争的内耗,不能在经济上以自由市场模式谋发展,也不能期待国家共同体缓慢融合,还不能坐等社会以自发方式缓慢变革。中国式现代化能成功,就是通过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深入社会基层的组织统一的强政党统御国家,让国家政治避免内耗,使得国家共同体建构与社会现代化改造快速完成,经济现代化基础快速建立持续发展升级并惠及全民。中国式现代化从正面证明了以欧美为蓝本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存在严重偏见。中国独特,但中国以强大政党推动国家发展的模式却为其他后发国家现代化开启了新的道路。

编辑 邓文科

The Implic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Driving force of Dominant Political Party

ZHANG Gangsheng¹

(1.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Summary: As the two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a and India have both made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modernization, while China's development is much greater. Why both China and In-

dia have achieved great development? Why China's developmen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India? Many researches generally find that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lies in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while most papers do not mention the role of the political party identified a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bviously, it i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two countries, especially China,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political parties. Therefore,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two countries'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order to answer why China and India hav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why China is ahead of India.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independence of China and India was achiev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 dominant political party with strong capabilities of mobilization. After independence, the dominant political parties of both countries having been taking lots of measures to promote state-building and transform their traditional socie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utilize state power to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through planned econom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s much stronger and longer than India's dominant partie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and durability of leading the country, so that China can implement various reforms more forcefully, which leads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significantly ahead of India's.

It was also found that after gain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2014, the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 has implemented the policies highly similar to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PC. First of all, the BJP has strengthened the power of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arty, enhanced unity, and expanded the number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party members on a large scale. Besides, the Indian government controlled by the BJP has been taking tough steps to promote state-building, society modernization and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The policies include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 to revoke the autonomous status of Kashmir, providing citizenship to religious minorities, abolishing traditional divorce rules to empower rights to Muslim women, taking tax reforms to unify the India's market,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vulnerable areas and groups, and so on. Compared with the CPC, the BJP has considerable gaps in its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nd national leadership, but its efforts to promote India's modernization are increasingly converging with that of the CPC, which reflects the commonn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Why are there many similarities in moderniz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 reason is that both countries are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huge populations. As a result, the two countries have many common dilemmas, such as weak state independence, heavy state building tasks, stubborn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high risks of disorder, lack of capit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neven internal development. Having confronted the common difficulties, both China and India have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dominant political parties to pursue modernization. The stronger the dominant political party is, the better it can solve the modernization dilemmas. Most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do not have huge populations, and some of them could achiev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ying on assistanc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However, the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even thos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require achieving the state-building, modernizing traditional societies, maintaining political order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vulnerable groups in society. Compared to the Western democracy, a political system with a strong dominant political party is more likely to overcome the aforementioned dilemmas of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dia;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dominant political party